

學術的謬誤與真相(上)

資料來源：《謬誤與真相》第二版(2011)，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著，

洪慧芳譯，八旗文化，中文版(2021)。

在美國，大學或學術機構的運作與企業的經營是不同的。以大學來說，來自學生的學費佔不到一半，私立大學平均不到 $\frac{1}{3}$ ，公立大學為 16%，即使是私立大學，也有來自聯邦政府的資金，而公立大學的多數資金，往往是州政府以外的來源。美國的大學常獲評為全球頂尖大學，主要是因為他們有能力聘請一些全球最好的學者。許多美國的大學有鉅額的捐贈基金，使他們能夠吸引最優秀的學者，美國知名大學如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的捐贈基金，就要比英國頂尖學府如牛津、劍橋要多上個二、三倍。

任何機構的運作方式和財務來源條件不同，都會促成不同的激勵機制，進而影響他們的行為。我們不要錯誤的以為「非營利」機構，就不會有自私的動機，而會致力於促進社會的福祉。學術機構依賴捐贈基金的這種特殊經濟因素，不僅影響了教師，也影響到大學如何處理經營成本及學生的教育，這在依賴業績維生的企業中是不可能發生的。

在法律上，美國大學的董事會定期開會監督學校的營運，投票決定重大決策，包括校長的聘用與解聘。然而董事會的成員通常還有其他領域的全職工作，在教育界工作的不到 20%。哈佛學院的前院長指出，校董會多數董事對學校的業務只有模糊的了解，並「不知道」大學校園裡發生了什麼事，監事會的成員甚至要看報紙才知道哈佛的重要改變。換句話說，多數董事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個人經驗來密切監督或評估校園活動，而教師則有任期制度，董事無法雇用或解聘教師，於是，校董會的運作愈來愈受到教師需求的指引，而且沒有其他的反向誘因可以扭轉這種現象。

大學的教師既是勞工，也是管理者。由於學術領域的專業需求，所以只有該學科的教授才有能力決定課程、招生、校園規則等政策，任何大學的校長或院長，都不可能有能力決定各個領域該開什麼課，或各課程的內容該教什麼。因此，教師自治原則是學術機構運作的核心，然而這個原則已經擴展到許多領域，甚至遠遠超出教授的專業範圍。教授的意見掌控著機構的種種政策，甚至在其專業領域之外，也在任意發表高見左右決策，而無須付出任何代價，於是某些大牌教授的偏好或禁令就足以影響決策。教師不僅在於他們擁有管理權，在工作中擁有自主權，也顯現在自己的職業安排上。像「終身教職(tenure)」這種在工商界無人知曉的制度，使他們在教學與研究方面享有學術自由，根本不必擔心遭到報復，但也使得多數學術機構，成為少數無法以糟糕決策為由來解

雇決策者的護身符。

正因為這種既是員工也是管理者的獨特身分，使他們有很多機會圖謀私利，而不以學生或機構的利益為首要考量，這點可以從排課、課程選擇之類的事情來見證。教授總是根據個人的方便來安排課程表，造成很多重點課程被排在相同的時段(衝堂)，如果學生必修課修不完就會不得不延畢，而延畢竟然只是因為教授要避開塞車時段，或在晚餐前能安排一下打球或健身。此外，因為課程都擠在熱門時段內(冷門時段則教室閒置)，使得學校必須再建造及維護更多的教室，徒增了教育成本，而這種不必要的成本對於一般企業競爭來說，可能是致命的。除了排課時間以外，大學也會開設一些狹隘的課程，反映的是教授個人的專長、研究方向或偏好，而不是為了學生的教育需求。在許多學校包括一些名校，有益於學生發展，而非教授個人方便，或有利紮好專業基礎的重要課程紛紛消失了。哈佛前校長博克(Bok)就指出，無論學生有多麼需要上更廣泛的課程，但很難找到夠多有意願且能夠開這類課程的教授。有些頂尖教授個人就能帶來數百萬研究經費，加上他們也很容易在其他名校找到教職，學校也就很難堅持要求教授開這些課，結果就是：通識教育的理想早已名存實亡！

還有一個問題是，人們常把研究型大學排名與大學教育的排名混為一談。各機構發布的大學排名更是加劇了這種混淆，為了排名，研究而不是教學成了教師的優先要務。學校如果想要增加教授的基本教學負擔，就會激怒教授！

成績膨脹是另一種為了教授方便，而不是為了學生利益著想的做法。不想認真學習，在初階課程選擇營養學分的學生，後來上高階課程時就比不上被嚴格把過關的學生。換言之，成績膨脹犧牲了學生整體的長遠利益，教授也比較輕鬆，不必面對學生對低分或不及格的抱怨。嚴格把關的教授反而不受歡迎，從教學評量的負評就可得見，而負評又會對教授的升等產生影響，形成一個特殊的循環。

在商業交易中，賣方產品的品質如果出了問題，客戶就會流失。在學術界裡，學生並不了解產品的品質，因為學生如果知道課程內容就沒必要去修那門課了，他只能感受教授在課堂上的傳達能力，但無法判斷是否遺漏了什麼或是否有其他更好的教法。教授也有可能教了無用或不正確的知識，但學生要日後才能體會出來。因為學生只上一次大學、只修一次相同的課，無法像買商品一樣有各種商檢機構公開訊息可以參考。或許有人說，不是有年度的大學排名嗎？然而，這些大學排名評比指標著重在教職員的數量與素質、圖書館的藏書量、師生比、以及他們獲得多少獎項、發表多少論文。各評估項目權重的分配也是主觀的，評估方式一旦改變，就有可能會造成排名上的驚人變化。事實上教授的知識和成就，並不會自動轉化為對學生更好的教育，結果就是，教授忙

於寫作與研究，很少或根本沒有時間投入教學。反而是教授的研究生承擔了大部分的基礎課程教學，這也成為所謂的「名校」中的普遍現象。學校的辦學績效，為什麼只衡量「投入」(可能是較容易衡量)，不是衡量「產出」？例如學校的教育品質或效率、學生日後的成就，以及學生對自己學校的評分……等等，或許是這些訊息不容易收集和量化吧！誠如萊斯大學的校長所言：「認證機構對學生學習什麼或如何學習不感興趣，他們只在乎每個學生可使用多少平方呎的教室空間。」沒錯，難怪這類排名廣受批評，也有越來越多的大學不願意參加或不提供資料，使得這類排名越來越失去有效性。

讓我們看看「師生比」能表達出什麼？師生比與班級規模之間的相關性非常小，只有在所有的教師都參與排課時，才能從師生比推斷出班級規模。研究型大學的教授自己抽離出教學專注於研究，甚至可能休假去別的地方做研究或做其他事，因為仍然占著名額，所以還是計入該校的師生比中。

以現在的科技手段，要以更低成本或更有效率來辦學是有很多創新方法的。例如，以線上讀物取代圖書館的書籍和學術期刊、教授親自下來講授基礎課程、聘請業界具有豐富實務經驗人士兼職傳授最新的專業知識、……等等。以企業經營的觀點，效率應該是計算一定量的「投入」，能轉化為多少的「產出」來衡量。以法學院來說，畢業生通過律師考試的比例，就是一個客觀的外部衡量標準。然而所謂的大學排名、通過認證機構標準……，這些學校為了獲得政府資金補助，或學校必須取得的認證，其影響力則是非常巨大的。這就像保護性關稅：保護了成本高的，避免他們受到低成本新機構競爭對手的威脅，可是也阻礙了平價型高等教育的興起。結果就是，傳統的老牌學術機構因為新型態的對手無法加入競爭，使得調降學費或抑制學費持續上漲的競爭壓力就變小了。

美國大學還有一個特殊的就業保障政策，衍生了獨特的結果，那就是所謂的「不晉則退」制度：老師在學校工作一定年限後，必須晉升到永久終身教職，否則就得走人不再續聘。升不上去，被迫離開的教師，甚至還不如沒有這種工作保障系統的其他產業員工。這是一好制度嗎？首先，學校在每位終身教授身上都得付出長期的高薪資代價，這些已經上車的人也會導致續聘要求變得更加嚴格。然而，並沒有任何證據讓人確信現在達不到要求的，他們未來不會取得成就；教師的流動對大學、學生及當事人來說都是成本，我們也找不到任何理由相信下一批新聘老師會比被迫離開的「表現」更好。這種學術晉升制度可以拿來解釋一種大學常見的現象：學生知道他們喜歡的優秀年輕教師遭到解聘時，往往感到錯愕不解，他們甚至發動抗議，可是也徒勞無功。所謂的「年度教師獎」反而成為年輕教師的「死亡之吻」，因為資淺的教師為了達到取得終身教職所需的研究數量與品質，他們並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準備優質的課程內容

及培養講課能力，更別說對學生特別的關注，也就是說，為此付出努力而得獎的代價就是無法獲得續聘。於是，那些大學往往會從其他地方聘用論文發表質與量皆已符合標準的學者，來補充資深高位。學校給得起高薪，並不代表該校的學生就可以獲得最好的教育，而且那些坐領高薪的頂尖教授有可能比較擅長教入門課程嗎？他們願意去教入門課程嗎？那些資淺的教師通常只是在該校短暫停留，他們必須做好準備(研究工作)，以提高他們在其他地方找到理想工作的機會，並積極準備前往各地去面試。一項分析教師如何分配教學與研究時間的研究就發現，在研究型大學任教的教師，他們做「教學」相關工作的時間只有不到一半！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項政策的目標與該政策的實際結果之間並沒有多大的關係！

許多大學及學術機構都有大量的捐贈基金或資金補貼，而出錢的人大多無法監督其運用效率，如果有人質疑，捍衛現行做法的方式，就是抨擊那些更省錢的方法將會導致教育品質惡化。

學術機構的聲望尤其是大學，主要取決於教授的研究論文，而學生在名校中，不見得能獲得更好的教育，因此，「名校畢業日後才能飛黃騰達」成為最大的謬誤。美國知名大企業的執行長中有一半多並非名校畢業，有些名人甚至根本就沒有畢業，如微軟的比爾·蓋茲和戴爾電腦的邁克·戴爾。畢業學校和以後的成就有多大貢獻並不容易確定，一般常用的衡量方法很容易誇大大學學歷的影響，尤其是名校，如果進入哈佛的學生素質本來就比進入州立大學的學生好，我們並不能把他們畢業後的成就歸因於學校的教育不同，如果真的要比，應該要比較哈佛畢業生和原本被哈佛錄取卻選擇去州立大學的學生，可是這種樣本太小了，無法做出有意義的統計分析。

一種常見的說法是，讀大學可以增加終生的收入。然而若考慮到學生在大學期間損失的收入，二者的終生「淨」收入以就業的年分除下來，再加上考慮延遲折現，其實差異也不大，何況他們各自的家庭背景也不同，更是難以有效的比較。試圖比較「讀大學」和「高中畢業後立即就業」的相對價值時，把大學畢業生高出的收入歸因於大學教育，這樣的歸因是不恰當的，因為影響收入的因素非常複雜，長期追蹤個體不但困難，成本也高，也很難符合統計分析的要求。

知名學校招生的錄取率都很低，可是為什麼這些名校每年還是要花大把大把的鈔票，在全美甚至海外招生？有些從來沒有想過申請名校的高三生，也會收到不少名校主動寄來的郵件，鼓勵他們申請。事實上，吸引那麼多學生來申請的動機之一，就是為了拒絕大多數的申請者，以便在大學排名中，維持「篩選嚴格」的聲譽。另一個動機是為了提供更多的候選人，來滿足教授從中挑選

菁英。由於名校的錄取率低造成的不確定性，也使許多學生為了保險，往往會申請至少一所無意就讀的學校。學生得同時申請多所大學，又帶來了大學的招生處無法確定錄取的學生中，有多少人會真正來註冊，為了避免招生不足，每個學校又要採取提前決定、候補名單、多輪候補……等策略，反而破壞了入學的公平性。這不但使得學生和學校都既耗費金錢也耗費時間，而且大家都痛苦嗎？於是高中需要聘請諮商輔導員、大學需要愈來愈龐大的招生委員會，也讓招生人員自以為很重要，覺得他們可以洞察申請學生的各項特質，如領導潛力、責任心、克服逆境、……等等，以及創造「多元性」等主流概念。結果就是招生處的人力、預算、權力的不斷膨脹，官僚體系也日益擴張。

學生讀大學的學費居高不下且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再加上書本費、食宿費，使學生畢業後要背負沉重的學貸好幾年，尤其在選舉年，政客又想把這些成本轉嫁給納稅人。然而，一般納稅人的收入不見得比普通大學畢業生高，這種以「幫助弱勢」的論點，來強迫納稅人補貼比他們經濟前景好的人，是站不住腳的。

在美國，大學的學費是很貴的，尤其是一些私立名校，在 2009 年的學費都超過了每年 3 萬美元，雖然真正支付那麼多學費的學生其實不到一半，因為很多學生都會拿到所謂的助學生(學費折扣)。可是，一年的學費仍約與美國家庭收入的中位數相當，因此，送孩子上大學的所有費用，成為了許多美國家庭預算中非常明顯的負擔。